



【忆海拾珠】

钱学森手上的神机妙算

1958年1月5日,钱学森突然接到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作为中国的专家,协助寻找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残骸。

“斯普特尼克1号”自从1957年10月4日发射成功之后,在太空运行了22天,由于卫星上的电池电能耗尽(那时还没有配备太阳能电池),失去了工作能力。“斯普特尼克1号”围绕地球运转了6000万千米,于1958年1月4日从太空向地球坠落。

在“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中国政府,宣称“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的地点很可能在东亚,其中落在中国领土上的可能性最大。对于苏联来说,“斯普特尼克1号”不论是进入大气层之后烧焦或者是坠落地面时撞成一团碎片,残骸都极具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这毕竟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当时,中苏关系良好,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答应尽力帮助苏联寻找“斯普特尼克1号”残骸。总参谋部当即把这一紧急情报通报各军区,逐级下达。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也通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请钱学森院长关注此事。

没几天,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报告,说是一位战士在值夜班时,看见一团火从天而降,划过夜空。会不会是“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很重视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的报告,决定从北京调一架专机飞往那里调查。王尚荣把任务交给了林有声,并请钱学森作为专家前去调查。

林有声,1938年9月入伍,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31师副参谋长,12军参谋长,后来担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在朝鲜作战时,在上甘岭采用坑道战术,建立功勋。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林有声回忆起了当年,讲述了一个

极其精彩的关于钱学森的故事:

这次前往实地考察的总共只有七八个人,除了空军派来保障飞行的一位干部,以及总参谋部派来的我外,其他的都是专家。钱学森和其他专家一样都是身穿中山装,穿着很朴素,个子也不高,中等身材,但绝对是一表人才。

那架专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苏联飞机,最多也就只能坐十几个人,飞机里面的噪音也很大,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没多说话。飞机飞得很快,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的时候是上午9点多钟。旅大警备区的司令员曾绍山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安排了吃住。曾绍山说,已经派了大队人马按照那位士兵所说的方位去找那颗卫星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

钱学森不住地问问题,问得很详细。等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后,钱学森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于是就跟曾绍山商量,让他们也一起去现场找找看。这时已经11点多,曾绍山就说要不先吃顿饭再去。但钱学森不同意,说哪怕晚点儿吃饭或者不吃,也要尽快去核实一下。曾绍山经不住再三要求,于是就带专家们一同前往现场了。

到了现场后,钱学森请部队同志把那位发现卫星降落的士兵叫来,让士兵把当时看到的情况再详细描述一遍,又让士兵回忆当时所站立的具体位置,然后又问他当时头摆在什么方位时看到火光的,火光从哪里划到哪里,成什么角度。钱学森一边让士兵模拟还原现场,一边就用笔在左手手心里写写画画。

因为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想到要带纸笔给专家备用,所以当时钱学森就只好拿钢笔在自己的左手心里画。我当时

就站在钱学森的旁边,看到他手心里画着一条抛物线,下面是一些阿拉伯数字,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外行可就看不懂了。

就这样,钱学森不停地写写画画,不一会儿他对我和其他专家说:“从士兵所描述的轨迹来看,不像是苏联卫星的轨迹。就算是那颗卫星的轨迹,按照这个火光飞行的角度,落在这里的可能性也不大,起码落在2000千米以外的地方,很有可能不在中国。”

钱学森得出结果后,就让曾绍山通知大家不用再找这颗卫星的遗骸了,这样会浪费大家的精力。这时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大家赶回市里,吃了一顿饭,稍事休息后就乘坐飞机返回北京了。

下了飞机后,这时北京的街边路灯已经亮起,专家们各自回家了,而我还要赶回单位汇报工作。到了单位,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钱学森计算得没错,卫星确实不在我们国家,苏联大使馆发来最新通报,卫星好像落到了阿拉斯加了。我听后,对钱学森敬佩不已。

钱学森那划划算算,除了他深谙火箭、导弹、卫星技术之外,还有他那从小培养的数学才能。难怪在美国的时候,连冯·卡门都一再夸奖:“钱的数学能力极强。”“钱的这种天资是不常遇到的。”

在钱学森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之后,每当苏联在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方面有了新的进展,钱学森总是应邀发表谈话、文章、评论。钱学森的身份,也总是“中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力学家”,从不涉及钱学森的“秘密身份”,诸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摘自《走近钱学森》,叶永烈著)



【声音】

刻意挑选的尊重就变味儿了

有记者朋友来找我,非让讲出点我爸阎肃的成功之道。我想了一阵,怎么想还是觉得老爸就是个普通人,普通的爹,厚道的老大爷。他自己也一直没敢把自己看成名人、艺术家,就觉得自己是一名空军的老兵。

但我这么说人家觉得我是谦虚。又说阎老博学多才、博闻强记、才高若干斗、出口成章等等。我心说了,您这是夸李白呢!而且如果这么总结一个人,对大家也没有实际意义,就像说爱因斯坦容量比别人大,咱也学不了啊!

记得从我小时候直到现在,但凡和老爸一起出门,在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花匠、木工、烧水的、大师傅、小战士,爸爸一律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打招呼:“您好!”我那时心里挺别扭,觉着自己这爸也太没派头了,跟谁都主动打招呼,还鞠躬,您用得着么!这时我就故意说他:“您认识么,就和人家打招呼?”老爸对于我的嘲讽口吻一般不予理睬。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他那是习惯与人为善,尤其是怕那些工人、小战士看见他紧张,所以不管认不认识都主动打招呼,好让大伙儿放松。

平时不管和谁约时间,包括司机,他总是提前5分钟下楼,就怕让别人等。这么多年老爸没教过我什么大道理,但一直在示范着一件事:尊重身边所有的人。

的确,尊重所有人对我们大家来说肯定不是高科技,可有多少人愿意去做或者能坚持做到呢!有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时觉得只尊重需要尊重的就行了,可这种刻意挑选的尊重也就不真实了,变味儿了。

老爸一生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但他始终发自内心地尊重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从国家领导人到小区里的园艺师,在他眼中都是生活的代表,都值得尊重,都应该用心走近。他亲切地对待熟稔的人,也温和地对待每一个初识的人,关注他们的感受和自尊;他感恩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为领袖、为名人、为海外华侨、为朋友写歌,也为许多普通官兵、不相识的歌手写歌。

尊重所有人,是老爸之所以不太普通的第一个普通点。第二点呢,就更简单了,就是一直不断学习。

从小到大我们家搬过七八次,我脑海里老爸在每处家里的场景大多是坐在书桌前的样子。

要说老爸一直没被淘汰,只能是得益于一直不断地学习,且对每件工作都认真对待。上世纪50年代,老爸就开始在空政文工团工作,那时候他自称是一专八能,能唱会跳,拉大幕兼管催场,还得给台口的灯添油。他自己说得挺热闹,但咱一分析,那不就是个打杂的嘛!但他自得其乐,并坚持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文学创作。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初创作出《我爱祖国的蓝天》《江姐》等优秀作品,成了专业创作人员。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戏剧市场不景气,需求锐减,但他能随即转身,认真学习研究电视晚会,并由此担任了十五六届春节晚会的撰稿及策划,同时创作出大量优秀歌曲。

到了2000年,我爸70岁了,体力精力都下降,创作上不免有些减退,但他仍然不断学习,琢磨生动语言的运用,并能吸收最新的知识、社会趣闻。那时正赶上访谈节目流行,也就成全了他成为最受欢迎的评委、嘉宾的好运。由于他思想贴近时代节奏,被央视一些朋友戏称为“80后”。但要知道,老爷子每次参加任何节目之前,都是认真做足功课,才有所谓的“出口成章”,让百姓爱听。

我爸其实就是这么个普通的人,做的也是这些普通的事,但一生坚持下来可能就不普通了。我想用王维的两句诗自夸一下我们家老爷子:“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他就是这样,在繁乱的尘世中留下自己清健的音律,但又安于平静朴实无华的生活。

(节选自《阎肃人生》,阎宇著)

【灯下碎语】

与吴学昭先生的通信

钱钟书先生去世十周年前夕,一本名为《听杨绛谈往事》的书开始热销,该书的作者、吴宓先生之女吴学昭,是杨绛先生交往密切的朋友,她在杨绛口述往事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访问搜集的材料。书稿完成后,杨绛先生亲自修改、题签并作序,声明:“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

此书在2008年读书界是一件大事,我趁着时机合适张罗着做一期关于钱和杨的专题。其中一篇,请吴学昭女士接受我同事刘琨亚的专访,谈《听杨绛谈往事》的缘起,谈她眼中的杨绛。三联书店的詹那达特别帮忙,他热心地为我们牵线,吴先生也拨冗接受了采访。此后,刘琨亚写就一篇一千八百字的文章《伟大的女性优秀的作家》。

专题是周日见报,我们的出版流程是,周四交稿,周五做版。周四晚,天冷,寒气逼人,十点多就恨不得被窝里看书取暖。手机响了,一看,詹那达。那达说,“吴先生昨天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觉得有个地方表述得不是很准确,怕记者理解有误,希望能直接与领导联络一下。是否能把你的电话告知她,或是你给她去个电话,解释一下?”正想着如何去电话时,手机又响了,010,哟,北京电话。传来一位女中音,京腔十足。她自我介绍:“我是吴学昭。”

然后大概意思是,刘琨亚采访中有个问题,她回答了,但采访结束后,她一想,觉得没表述清楚。希望我能从中把下关,然后把稿子发一份到她的电子邮箱,让她看一下。整个过程特别礼貌、客气、温和。我心放下了,允诺稿子发与她审阅。

现在邮箱中,看到的有五封,主要是吴学昭的信,每封信都特别简单,有事说事,说完结束。

吴学昭与杨绛、钱钟书的关系的确错综复杂。她的

父亲吴宓是钱钟书和杨绛在清华的老师,吴宓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清华学校是同事,以后一直保持往来。杨绛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吴学昭大姐吴学淑的同学。吴学昭最初听说钱钟书、杨绛的故事,主要是通过杨必。有了这几层关系,两家就属于世交。钱瑗去世以后,吴学昭开始主动帮助杨绛打理一些事务,接触多了起来。杨绛的谈吐幽默,思考敏锐,处事沉稳,眼光深邃,使她惊叹不已。她习惯把每次杨绛和她的交谈、杨绛的所思所想,都记下来。久而久之,竟然记了好几个本子,每次翻阅这些读“杨”笔记,都让她觉得获益良多。由此,吴学昭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杨先生写一部传记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可贵的资料和感受,应与所有喜欢杨绛先生作品的读者共同分享。”一开始吴学昭还有点顾虑,自忖文笔不佳,杨绛未必答应。让她有些意外的是,杨绛先生欣然同意。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了《听杨绛谈往事》,我是不会与吴学昭有任何关系的。之前坊间传闻多多,一些书中或是网上的消息,也颇有微词。比如,她跟父亲吴宓关系很恶劣。“文革”中改名“萧光”,跟父亲划清界限,并训话,是吴宓先生深感痛心的事。“文革”后期,吴宓行将去世,当时其所在高校西南师

范学院要吴氏姐妹前去照顾,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妹妹吴须曼(吴宓本名为陀曼)接回老家,没过多久吴宓就离世了。吴宓死时,连葬礼子女们也拒赴,这时已经是1978年,离改革开放一步之遥。“文革”后,吴学昭返京,作为吴宓继承人,除编辑出版《吴宓日记》外,也为吴宓身后资料归属和吴宓传记发表等问题跟各方多有纠纷。比如,吴宓晚年的学生周锡光1973年前后从吴宓处取得了一些文稿、讲义等,1992年吴学昭起诉周锡光取得了她父亲的文稿要求归还,最后周出示吴宓手迹:让周“永久保存”、“完全不许归还”的字条,才算了事……

历史真面目总归有人去评判。顾准去世前极希望见子女一面,也是没能见上,最后含恨而亡。顾准死后成名时,其儿女纷纷返回来要和舅舅陈敏之抢父亲的名誉权,著作出版权。陈寅恪年迈眼盲脚残之时,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外,平时也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以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

“笃实忠厚,聪明正直”,是杨绛对吴学昭的评语。(摘自姚峥华著《书人依旧》)